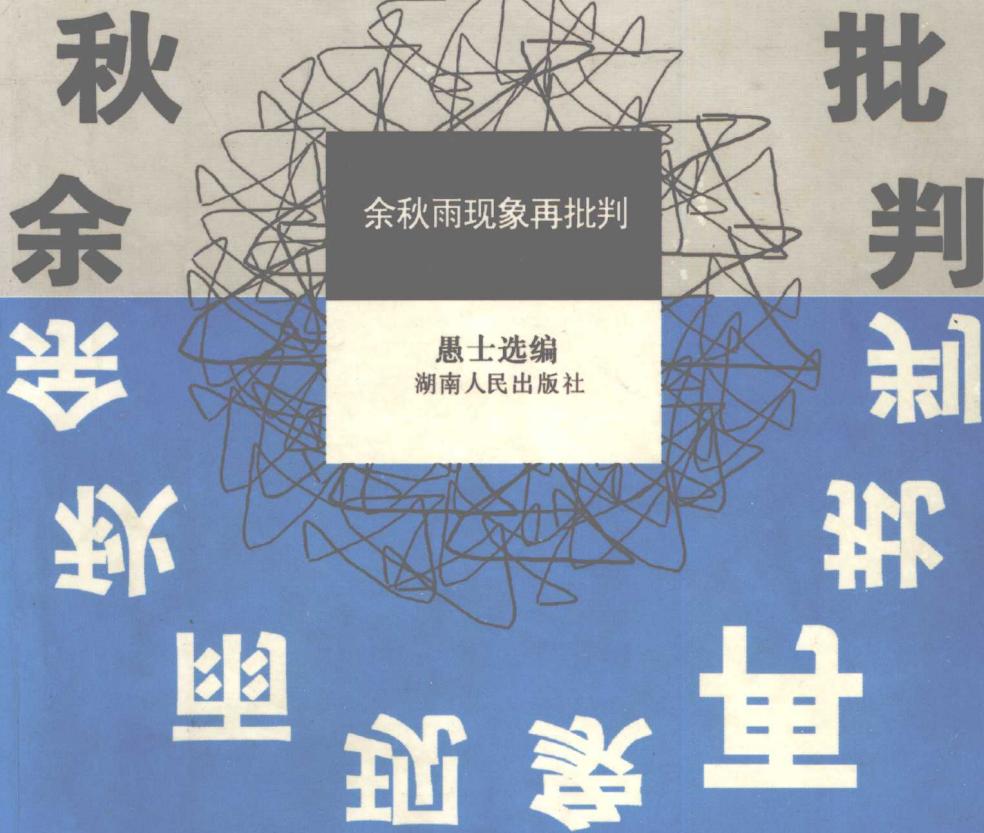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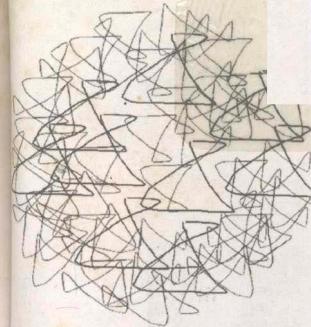


雨现象再批判



余秋雨现象再批判

愚士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反秋雨现象再批判

批判湖南林業問題



愚士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秋雨现象再批判/愚士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7

ISBN 7-5438-2334-9

I. 余... II. 愚... III. 当代文学 - 散文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5218 号

责任编辑: 唐长庚

装帧设计: 郭天民

余秋雨现象再批判

愚士选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09,000 印数: 1—8,000

ISBN7-5438-2334-9

I · 304 定价: 25.00 元

编者前言

愚士

去年9月，《余秋雨现象批判》出版之后，反响十分强烈，全国许多报刊进行了评价和综述，并被列为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成为文化界和大学文科师生的参考书目，这是令人欣慰的。

然而，新千年伊始，文化界和学术界关于“余秋雨现象”的研究和探讨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向深层次纵深发展，从对余秋雨先生散文的争论跃升到对余秋雨先生“文革”写作的审视；由对全民族历史灾难的反思转化为对知识分子忏悔意识的企望。这种讨论的深化已远远超越了对余秋

雨现象的研究而上升到对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性格的探索。对上述这些重要的问题，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及文化工作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空前热烈，当事者（包括余秋雨先生本人）也积极在这场讨论中主动发言，全力辩论反驳，以至引起了更大的反弹，导致更直逼的深究，争论双方都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自由的话语空间，这都给这场讨论增加了更加诱人的新世纪特色，构成了新千年伊始学术界、文化界一道炫目的风景线。这场关于余秋雨现象批判的延续是很有文化意蕴和研究价值的。

所谓“批判”，这在学术上是一个不带褒贬的中性名词，即批评、探讨、研究之意，这与“文革”中的“大批判”那种政治声讨的专横武断有本质区别。我们认为，对一个作家和学者有褒有贬，毁誉参半，都是正常现象。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视角对同一个作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这场围绕余秋雨现象的批判和争论，完全不同于往昔多少年来重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批判运动”，它没有官方意图，没有政治背景，没有剥夺（也剥夺不了）被批评者的辩驳权，而完全是文化学术界人士自发地建筑在充分说理基础上的真正的学术辩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去年出版的《余秋雨现象批判》已远不能概括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全貌。为了给今后的文化事业保留一些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了给广大读者和文化学者提供 2000 年余秋雨现象最新发展的文化动态，我们继续选编了这本《余秋雨现象再批判》。但愿这部信史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和文化学者重视的案头读物，能够成为研究 21 世纪中国文化现象的重要资料。

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全国各地一些专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对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2000 年 6 月初夏

目 录

第一辑

余秋雨散文透视.....	林贤治(1)
本不想说余秋雨.....	易中天(9)
余兮余兮奈若何.....	杨早(19)
换个角度看余秋雨.....	谢泳(24)
余秋雨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樊星(29)
文化中的文化.....	肖夏林(33)
“小说化散文”.....	王彬彬(46)
平心静气观秋雨.....	尹昌龙(50)
评余秋雨九篇.....	苏康哲(54)
硬逼文人充圣人.....	李骏虎(62)
秋风秋雨喜死人.....	旷新年(67)
慎用批评伤害批评者.....	袁良骏(72)
“炒作”新析	从维熙(75)
历史的错位与美学的偏执	
——就《抱愧山西》一文与余秋雨先生商榷	浩明(78)
一片赞扬中的逆耳忠言	
——余开伟批评余秋雨兼谈批评精神	哈米(99)

苛刻的酷评.....	宁志荣(103)
逆耳忠言叹秋雨	
——余秋雨现象批判综述	嘻 谷(107)
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	王开林(121)
登坛的失误.....	余开伟(137)
关注“岳麓书院事件”	邓 菲(139)
电视文化与精英文化结缘	
——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杜维明讲学评述	余开伟(144)
重话麓山秋雨.....	陈书良(153)
批评别人与反观自我	
——我对余秋雨岳麓书院讲学事件的批评态度.....	江 堤(156)

第二辑

怎样清算“文革”	
——“余秋雨现象”题外话	钟友循(165)
沙叶新与余秋雨	
——《秋风秋雨愁煞人》读后	孔祥敏(181)
余秋雨不会反思.....	楚 子(186)
余秋雨的变与不变.....	熊元义(192)
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	古远清(198)
不必偏袒余秋雨.....	袁良骏(205)

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

- 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写作 张育仁(209)
二余之战 初夏又燃 张 鑫(225)
余文一出 令人不快 张 鑫(228)
新二余之争的奥妙 刘绪义(230)

第三辑

-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余 杰(238)
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
 ——答余杰先生 余秋雨(258)
余秋雨郑重声明——
 我不是“文革余孽” 杨瑞春(266)
余杰声称——
 我要他一个反思的态度 杨瑞春(269)
余秋雨余杰在魏明伦家坦诚对话 杨瑞春(271)
余杰纠正“二余和解”之说 解玺璋(274)
忏悔话题 祝 勇(278)
余秋雨，你用不着忏悔了
 ——谈余杰妙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祝 勇(283)
鬼才·变脸·晕头转向
 ——我为什么批评余杰 祝 勇(289)
扯淡的范例 刘洪波(303)

给余杰的一封信 钱理群(307)

第四辑

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 于光远(316)

正视历史 轻装前进

——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 孙光萱(321)

戴厚英和余秋雨 黎焕颐(334)

我们有罪 我们忏悔

——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余 杰(345)

也谈忏悔

——从余秋雨的“不忏悔”说开去 蒋 泥(372)

第五辑

打开历史的黑箱

——文革“写作组”剖析 古远清(383)

余秋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杨瑞春(397)

余秋雨是否逃避历史事实 余开伟(406)

亮出你的观点或者空空荡荡 易中天(413)

历史见证人见证当年历史 《北京晚报》(419)

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 孙光萱(423)

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余 杰(428)

人民有权利调查事实 王友琴(432)

余秋雨欺骗了读者什么	刘绪义(435)
老余，你可以不忏悔	雷池月(441)
余秋雨如何面对自己的“烙印”	黎焕颐(446)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徐友渔(450)
忏悔是个人的自由	
——为余秋雨一辩	于 坚(456)
无法回避的历史诘问	余开伟(461)
余秋雨，民族赋予我们追究你的权利	野 花(464)
狂甩	金生叹(467)
“余秋雨孤身查案”考	杨铁原(469)
白岩松会诊余秋雨	鲁 平(472)
余秋雨被推上文学法庭 “罪状”：谋杀散文	天 府(474)

余秋雨散文透视

林贤治

余秋雨暴得文名，在于“边缘文学”著作《文化苦旅》。在大风暴之后，他以一种为评论家所称的“文化随笔”，把人们拉回到往古的废墟里去。除了后来出版的集子《霜冷长河》，所写大抵属于遗址文化，典籍文化，其实也就是死文化；不同于汪曾祺的吃，贾平凹的性，以及活在他们中间的风俗文化。贾平凹重现世的，余秋雨重历史的；贾平凹要“受活”，余秋雨要“反思”；贾平凹要玩，要趣味，要自在，余秋雨则总是要感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的笼罩，纵然他一再自称是“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却不见半点惟漂泊者所有的孤独与凄苦。余秋雨身为学者，这种身份的认同感，会使他最后“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但他又不失为才子，有“萎靡柔弱”的一面，故而也会“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希望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如果说贾平凹生活和写作在较为纯粹的中国旧文人的阴影里，那么，余秋雨则生活在“王朝的背影”里，是两种不同的霉味。

在返回历史的旅途中，余秋雨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大势力上面，就是权力者和知识者。无论对其中哪一种势力，他都不曾持批判的态度。由于缺乏某种较为固定的审视的框架，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的许多残酷的血腥的情节，都在陈述中仿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成了可以避免的偶然。

在名篇《一个王朝的背景》中，余秋雨赞颂大清康熙皇帝“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人格比较健全”，说康熙的避暑行宫即有名的“避暑山庄”是“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所‘吉他’”，感叹说：“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在余秋雨看来，正是康熙圣明的“王道”，致使汉族知识分子与之“和解”。文中列举了为康熙王朝服务的大知识分子黄宗羲、李颙等，说：“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于是反诘道：“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还指出，雍正帝写《大义觉迷录》也是颇为诚恳的。文末写到王国维殉清事，说这正是文化与朝廷分不开，是汉族高层知识分子与朝廷产生的某种文化认同尚未消散的表现。结穴处写道：“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

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的真实性被抹杀了，曾经存在于历史上的民族和阶级的鲜明界限被抹杀了，那些曾经激荡过数代人直至孙中山章太炎鲁迅一代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的斗争，都成了无足轻重的儿戏。无利害、无是非的混沌的“文化生态”代替一切，高于一切。鲁迅的早期著作姑且不说，他在晚年写的《隔膜》《买〈小学大全〉记》《随便翻翻》《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多篇文章中，都曾援引大量史料，揭露了清王朝的文字狱的凶残。其中有记录说，一些被征服者就是因为“隔膜”，相信了清朝统治者用的中国的“爱民如子”、“一视同仁”的古训，上了如余秋雨辈说的“诚恳”的当，“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结果被杀掉。鲁迅明确指出：“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都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这样的结论，同余秋雨说的完全两样。鲁迅还认为，倘有有心人将有关史料加以收集成书，则不但可以使我们看见统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恶辣，手段的惊心动魄，还可以因此明白，我们曾经“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令人感兴趣的课题是，“余生也晚”，何

以竟如此清楚“好皇帝”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英明伟大呢？何以独独喜欢选择知识分子服事与身殉一个王朝的这样一节故事呢？还是鲁迅说的好：“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在余秋雨这里，文化是一堵屏风，遮蔽了真实。他所以如此，无非借维持所谓的“文化生态”，为古今知识分子的变节、附逆、卖身投靠权势者的无耻行径而极力辩护、开脱罢了。

余秋雨明显夸大了文化的价值，把文人当作“人文”的代表，尽量加以美化。《流放者的土地》历述清朝流放犯在边地留下的文化福泽，赞美他们“内心的高贵”；《千年庭院》写书院讲学的朱熹，如何以振兴教育为念，“恢复人性，改变素质”，冶炼“文化人格”。文化知识的传播功不可没，但是，在这中间，官方意识形态对人性人格的销蚀和破坏，知识传授者其实也是说教者的奴化心理，则根本不曾引起余秋雨的注意。文中引朱熹的话说：“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为统治者服务，为国家服务，这种人生价值观念是作者所认同的。在余秋雨的书中，知识者充满着对权力的渴慕，为事业计，不惜迎合与周旋；自然也得保留一点自尊，即所谓“文化人格”，说穿了不过“面子”而已。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余秋雨把藏书楼天一阁的历史看做是“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盛赞创建人范钦——官至兵部右侍郎——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以及借以支撑的一种“冷漠、严峻”的意志力。相反，文中对另一位藏书家丰坊，则批评说是“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

太随心所欲”，“不懂人情世故”，“太纯粹”，“缺少旋转力”，故而事业无成。余秋雨从文化史中读得出来，文化人的命运总是任人摆布，不能自主的。“‘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在渴望自主和依附均不可得的时候，为了结束精神苦旅，余秋雨欣赏历代受挫败的文人的种种解脱法。一是精神胜利，以文化的永恒也即“三不朽”的“立言”为资本，保持对实际胜利者的傲视，再就是取法老庄及佛教，力求超脱，淡泊和静定。据余秋雨的书说，苏东坡就是这样“突围”的。但是，对于世俗的利害，余秋雨是颇为看重的；从《庐山》的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文人在他心目中的真正地位是什么。面对庐山先为政治家所独霸后为中外大官人、大商贾所共占的事实，他愤愤不平地问道：“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又说：“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这是一种醋意。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儒道互补的处世原则，原也是对大儒，即多少具有独立人格的大知识分子而言的。余秋雨，作为一般文人，我们自然不必以“兼济”之

志相要求；他常常写到退隐，但也绝非“独善”，因为这是需要具备自省的能力的。他认为，退隐“与显赫对峙”，“与官场对峙”；而“最佳的隐潜方式”则是：“躲进江南小镇之中”。这是一种颇为独到的眼光，他说：“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他不满于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都因为具有“小”的格局，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关于苏州，他没有盛赞“圣朝气象”的种种，着眼的是其中的“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唐伯虎是此间的著名人物，称得上“非官方文化”的代表，余秋雨称之为“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大约是把他当作处于仕途不畅阶段的文士的一个样板的罢？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隐士是最接近官僚的。余秋雨抱同情于文人的“隐蔽”，虽谓是不得已，但也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用他的话就叫“人生范式”：在保全生——现代相对应的语词就是“安全感”——的基础上，如何以最稳妥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既可避免官场的纷扰和险恶，又能获得一切，“精神”与“体魄”兼全，“深邃”和“青春”同在，无衣食之虞，而有园林美女之乐，最终还可以让历史“把他的名字记下”。

余秋雨的才子气，在《吴江船》中有着最为恶俗的表现。文章以“文革”为背景，写大学生派出的战斗组，由工宣队率